

福州路上的书店

杨蓉 谈玲

自上海开埠以来，福州路见证了
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崛起与繁荣。福州路上的书店最多曾达300余家，还有各类新闻出版机构、文玩店铺入驻，满足了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福州路上的书店，都发生着“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往昔

早在百年前，福州路及附近的棋盘街、望平街一带，交通方便、信息灵通，房地租价适中，很适合办文化事业。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的出版机构逐渐向河南路以西、福建路以东、汉口路以南、广东路以北的区域汇集，最终集中于河南路、福建路之间的福州路一带。

从《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可以看到，20世纪40年代左右，福州路沿街至少可以看到有大东书局（福州路310号）、世界书局（福州路390号）、开明书店（福州路278号）、科学仪器馆、国粹书局、有正书局、大众书局、中央书局、南京共和书局、春明书局、申报馆、群众图书公司、北新书局、光华书局、现代书局、光明书局、中央书店、新月书店、美的书店等。广益书局、百新书店等在福州路开设的分店，都有较宽阔的门面，与福州路河南路口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互相辉映，基本上构成了福州路文化街的格局。1946年版的《上海指南》列31家书店，其中有14家坐落在福州路，另有11家位于与福州路交会的河南路、望平街（今山东中路）一带。

商务印书馆是上海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中资出版社，出版了众多优秀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与商务印书馆并驾齐驱的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量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还出版了《各国对中国的平等条约》等书籍。此外，还有许多知识分子集资自办的出版社，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如开明书店，以出版教科书和学术书出名；亚东书局，出版由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胡适编辑的《守常文集》等著作，在五四新青年中广泛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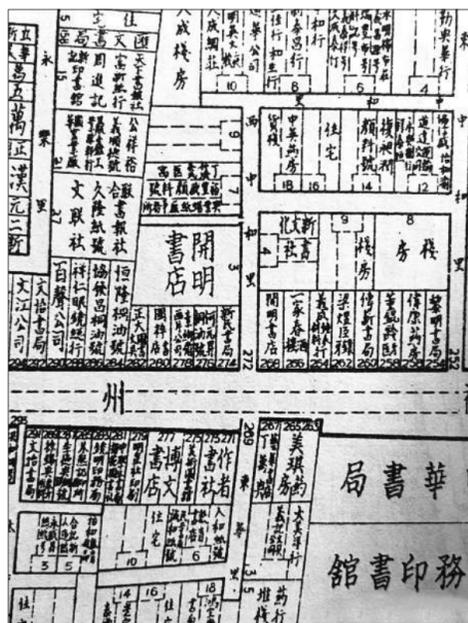
以福州路为中心的出版机构聚集，且这一空间集聚的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近代率先采用机器印刷的墨海书馆，1861年由老城厢迁至山东路麦家圈（福州路以南的山东路一段），标志着现代出版技术正式落地福州路，从此，现代出版技术在福州路各书局间散播开来。

1951年，新华书店华东总店在福州路世界书局落户。同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开明书店等组建为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之后，经公私合营和多次拆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迁往北京；一部分书局进行改制，如大东书局改为美术书店，世界书局改为国际书店（后更名外文书店）等。

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政府致力于打造福州路“文化街”。1994年，上海书城选址在福州路上。1998年12月，经营全国800多家出版社的各类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品种达十



录》第一编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局部）
▲一九三九年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



▲1946年版的《上海指南》（局部）

余万的上海书城在福州路开业，一举成为远东最大的书刊发行中心。时至今日，福州路与上海书城都是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文化符号。

福州路寄托着人们有关出版精神文化想象的记忆。福州路一带书店虽开开关关，但依然是上海书店密度最高的街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旧址也成为“网红打卡地”、封存近代出版业辉煌的历史记忆之场，一再被人们谈及。

今朝

但近年来，受网络购书、电子阅读等冲击影响，实体书店举步维艰。随着出版业“巨无霸”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外迁，以及多个地块因城市更新、旧区改造而封闭，福州路的文化氛围大不如前，书店也越来越少。

福州路最著名的书店大众书局，在

2017年关张，而在2012年，大众书局还是上海唯一一家24小时书店。1998年底开业的上海书城，2023年10月改造复开，但单独一家书城无法让福州路重振雄风，福州路以后怎么办？福州路是否还是上海的特色文化街区？都是城市更新必须回答的问题。

2024年，拥有百年历史的书店品牌百新书局全面焕新，在福州路620号正式启幕，约1200平方米的百新书局，由“百物一新”“饱读Bookstro”“饱读书房”“汇丰纸行”“啼笑音缘”与“百新播客”六大空间组成，它们在“百新书局”的品牌下，强调精选形成的整体调性。新店除了将侧重整餐饮，还将与南京东路街道共建福州路614弄社区文化空间同

心驿，聚焦书香文韵主题，打造“一分钟生活圈”。

上海书城周边开着不少礼品店、文具店，有一定的规模和集群效应。在多家文玩店铺的簇拥之下，福州路书店的另一块集中地静静地迎接读者，这就是福州路424号艺术书坊和390号外文书店。这两家书店都已经经营几十年，坚持行业特色。艺术书坊2楼九华堂、3楼艺苑真赏社经营古旧书籍、字画等收藏品。马路对面的上海古籍书店、上海旧书店，因店面装修，暂居艺术书坊2楼。外文书店或为福州路现存书店人气最佳地之一。一楼有黑胶唱片展，配合欧洲杯赛期设了球星卡专桌。据了解，这些“二次元”外文读物和产品近年销售量很大，增长强劲，这也坚定了外文书店留在福州路、开发年轻人喜欢的新商品的信心。

通过实地调研，福州路现存书店已仅余六七家，仍有继续减少且单一化的趋

势。凭借福州路的文化底蕴，结合咖啡、文玩、旧货、展览、文化交流和图书馆等相关业态，提供书刊阅读场景的店铺与场馆，也有六七家，历史上曾有过的实体书店一条街逐渐远去。

未来

福州路近年一些老店铺的衰落，很大原因是它的业态和正在成长的新用户之间在审美和感受上有了区别；老店铺的经营方式和陈列方式，与现在主力消费人群的生活体验有了一定差距。

2024年6月，来自学界、建筑规划界、出版界、实体书店、商业地产界、媒体界的十余位行业资深人士，在同济大学齐聚一堂，介绍过去两年多对上海福州路文化街区历史演变、现状困难与未来更新策略的研究。“强烈的求生欲望”，也是当下的福州路沿线所有商业主体应该重视并拥有的，“同理，把生存逻辑走通的城市更新才有未来，才可能走得更稳、更久”。

日前，拥有百年历史的品牌书店百新书局全面焕新，搬去了离西藏南路和来福士广场更近的福州路620号。从经营理念、目标客群，到店内空间布局、营销资源组合，都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外文书店近年来因为时刻保持对年轻群体及其相关文化、亚文化现象的关注，以书为媒，与一些城市节庆、重要会展、文化传播热点深度联动，通过借力和引流，为拓展自己的事业打开新空间。

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到福州路书店，各类新书发布会、读书分享会、讲座论坛等活动在福州路举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

综合多方面的观点，对于福州路的未来如何发展，主要集中在多元经营、社区服务、政策扶持和文化保护等方面，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要群策群力，守护好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直面困境、努力突破，争取在不久的将来，重新擦亮福州路这张城市文化名片。

（作者杨蓉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谈玲系民进上海市委研究室副主任）

广西三江侗族花蝶纹破线绣背扇盖帕

周佳



刺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二〇一六年李惠贞捐赠 中国美术馆藏

这件来自广西三江侗族地区的背扇盖帕采用破线绣的方式，绣出花卉、蝴蝶等纹样。所谓“破线绣”就是将一根丝线破成8至12根，再用皂角水把破出来的丝磨平打光之后进行刺绣。色彩斑斓的绣片按照刺绣的花形剪成小块，连缀到靛蓝色的底布上，形成大大的圆形，象征着侗族人崇敬的太阳。

这件背扇盖帕的捐赠者是香港福慧教育基金会副主席李惠贞女士。2016年，她将自己从美国购回的1770件背扇无偿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使大量遗散海外的文物回归祖国。这些背扇来自贵州、云南、湖南、广西等地，制作年代从清晚期到20世纪80年代。如此大规模、高品质的民间美术捐赠，是对国家与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巨大贡献。美丽的背扇不但将西南黎乡人的情感连在一起，也将所有中华儿女的情感连在了一起。

一起。

中国西南地区的妇女在赶集或者从事田间劳作的时候，习惯把幼儿背在背上，这种用于背负幼儿的带子就被称为“背扇”或“背儿带”。背扇的造型大多呈T形，由背扇心、背扇手、背扇脚及背扇盖帕组成。背扇心用于包裹和支撑幼儿背部，一般为50至70厘米见方；背扇脚用于裹住幼儿臀部及双腿，其形制在各地区不尽相同；而长达二三米甚至十余米的背扇手能将婴幼儿紧紧系绑于母亲身后；背扇盖帕则用来遮护幼儿头部免受风雨侵袭。

在西南地区，人们把生育看作头等大事，背扇的制作自然也最用心、最精细。妇女们把孩童时代就开始练就的织绣本领都施展在背扇之上，有时，一件小小的背扇上能同时出现破线绣、马尾绣、打籽绣、贴布绣、锁绣、挑花绣等近10种复杂的针法。

兰亭砚的故事

火来胜



觞放入溪中，让其顺流而下。这场雅集很有雅趣，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41位文人学士饮酒赋诗，汇诗成集。雅集时王羲之还即兴挥毫作序，序中描绘了兰亭附近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曲水流觞、惠风和畅的景致和王羲之等人集会的乐趣，抒发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感叹。此序不仅文字优美，在书法上酣畅淋漓、潇洒流畅。

砚台吸纳了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其制式、纹饰和铭文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形象，表现了人们对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乐于奉献、廉洁奉公、崇尚孝道等方面的志向和情操追求。其中，兰亭砚制式是最有代表性的砚台形制之一。

兰亭砚是受王羲之兰亭雅集的影响而创作出来的砚台形式。据记载：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在浙江兰亭，进行了一场名为“修禊”的传统活动。在这次雅集中王羲之组织搞了一个小规模酒会，酒令是“曲水流觞”，41位名士坐在蜿蜒曲折的溪水两旁，将斟酒的羽

（作者系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砚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专家委员会主任）

彩绘漆木卧鹿

2002年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的彩绘漆木卧鹿为陈设器。鹿呈反首盘曲状，翘首顾望、神态娴静。目前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彩绘漆木卧鹿头、身分别用整木雕成。通体髹黑漆，红漆绘鹿斑纹。

战国 2002年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



“民间大使”——印尼华人唐裕

本报记者 照宁

在厦门华侨博物院的展厅中，陈列着东南亚地区著名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唐裕所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普拉塔玛”勋章及证书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人民友谊贡献奖”奖章及证书。这些奖章是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给予唐裕的最高荣誉，它们见证了唐裕为推动印尼与中国邦交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

1926年，唐裕出生于印尼棉兰，祖籍福建安溪。作为一名印尼华人，他

始终希望看到亚洲邻邦能友好相处、共享繁荣。唐裕曾以个人影响力，在中印尼两国复交、中新两国建交两桩历史性事件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故有“民间外交大使”的美誉。

20世纪50年代，唐裕到新加坡经商，创办敦那士有限公司，自制油轮经营石油运输于印尼和新加坡之间，事业不断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已成为新加坡航运界的杰出人物。他曾拥有200多艘船的船队，荣任新加坡船务公会主

席，有新加坡“船王”和东南亚“航运巨子”之誉。

1983年，时任新加坡总检察长兼国家石油公司主席陈文德想到厦门考察寻根，因中新尚未建交，就请唐裕作为中新友谊的引路人，带领他访问厦门。随后，在陈文德的支持下，唐裕邀请时任福建省省长胡平率福建省代表团率先访问新加坡。这些往来增进了中新友谊。

唐裕非常关心中国和印尼的友谊。从1977年开始，他就为两国恢复直接贸易

和复交而奔走。他以印尼工商总会名誉会员的身份，于当年春推动该会会长苏坎达尼率团参加广州交易会，迈出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一步。1985年，在唐裕的牵线安排下，中国和印尼两国政府签署两国恢复直接贸易备忘录，使中印尼直接贸易中断18年之后得到恢复。

“促进中新友谊、推动中国与印尼复交，这些我都在穿针引线，我不为名为利。”唐裕曾经说，“我们要自己强，也希望其他民族好。”

为表彰唐裕为中印尼两国建设作出的积极贡献，1998年，印尼政府授予唐裕国家最高荣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普拉塔玛”勋章。2009年11月5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唐裕“人民友谊贡献奖”奖章及证书，证书上写着：“鉴于您多年来在促进两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取得出色成就，特颁发人民友谊贡献奖，以表敬意！”